



中国近代翻译史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in Modern China

李 伟 著

齊魯書社



中国近代翻译史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in Modern China**

李 伟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代翻译史/李伟著. — 济南: 齐鲁书社,
2005.8

ISBN 7-5333-1538-3

I. 中… II. 李… III. 翻译—语言学史—
中国—1810~1920 IV. H159-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77418 号

中国近代翻译史

李 伟 著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E-mail: qlss@sdpress.com.cn

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125 印张 2 插页 246 千字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3-1538-3

K·474 定价: 25.00 元

序

西学翻译虽然并不始于近代，明末清初就已经有了，但近代却是西学翻译的一个最重要的时段。1840年前后，随着西学东渐，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一些有远见卓识的士大夫开始看到西方文化的优势，于是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策略。随着时代的前进和认识的深化，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又提出了“学习西方”的口号。要学习西方，必先了解西方，“西学东渐”正是在这一时代的要求下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前发展。

近代中国所谓“西学”，即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总称，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西方文化，它主要是指文艺复兴以来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欧美文化，其基本内涵与精神就是科学和民主。它是较之中国古代文化更富有生命力的文化。

近代中国对西学的译介是有一个演化过程的，大体说来，首先是自然科学的翻译，其次是社会科学的翻译，最后才是文学的翻译，这一过程也标示着先进的中国人对西学内涵和价值观念认识的变化。科学的、完整意义上的“中国近代翻译史”应包括如上三方面的翻译活动。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政治上、经济上改革开放的深入，在学术领域对翻译特别是近代翻译的研究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学人们从近代翻译的不同侧面、不同角度、不同时段开展了深入的研究，出现了不少有分量的专著，熊月之先生的《西学东渐与

晚清社会》就是这方面有影响的著作。

李伟君治学勤奋,为了更深入地研究中国近代史,近年来十分关注近代翻译。在前人对近代翻译研究的基础上,他又做了很多工作,对近代翻译也有自己新的理解。他的这部《中国近代翻译史》按历史的顺序,分五个阶段对鸦片战争前后至“五四”新文化运动百年来的翻译史进行了系统而有重点的论述。它是了解中国近代翻译历史的一个简明的读本,不论对于一般读者和研究者,它都是一部有用的书,这也是李伟君对中国近代翻译史研究的一个贡献。该书即将出版,令人高兴。

我于中国近代翻译缺乏研究,只是因为研究中国近代文学的需要,曾涉猎过近代翻译文学,但也很不深入。今李伟君问序于余,我感到难以胜任。但李伟君热情可感,故写了上面的一段话,聊作序,并对李伟君《中国近代翻译史》的出版表示祝贺。

郭延礼二〇〇五年暑期写于山东大学

前 言

列宁说：“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① 当语言不通时，只有借助翻译才能进行正常的交流。翻译的含义有两种，一为从事翻译工作的人（Translator），一为翻译活动（Translation）。一般而言，我们所说的翻译是作为活动的翻译。因此，翻译是不同民族、语种间进行思想文化交流的中介手段和转换形式，它“是把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话语），在保持内容不变的情况下改变为另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②，即翻译是运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内容和意义准确而完整地重新表达出来的语言活动。

我国翻译的历史，至少可以上溯到周代。《礼记·王制篇》记载：“中国、夷、蛮、戎、狄，……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③ 这里的“译”就是专指北方的翻译人员。到了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称：“译者，传译四夷之语者。”^④ 而《隋书·经籍志》中也有“汉恒帝时，有安息国沙门安静，赍经

①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0页。

② [苏] 巴尔胡达罗夫：《语言与翻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页。

③ 《礼记·王制第五》，见孙希旦《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59—360页。

④ 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57页。

至洛，翻译最为通解”^①的记载，这说明汉代翻译已有很大发展。

中国古代的翻译主要包括民族翻译、佛经翻译和西学翻译几种类型。民族翻译从周朝至清代一直存在，主要负责与周边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佛经翻译始于东汉，在唐代达到最盛，朝廷专门设有译场，组织严密，规模宏大；西学翻译则起自明末清初，出现了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叶向高等一批翻译人才。

2 古代翻译的形式主要有口译与笔译两种。口译者又称“舌人”，是最初的翻译者，其出现的时间当在春秋之前。左丘明著《国语·周语》即提到“舌人”：“夫戎、狄，冒没轻儻，贪而不让。其血气不治，若禽兽焉。其适来班贡，不俟馨香嘉味，故坐诸门外，而使舌人体委与之。”^②“舌人”的工作主要是在外交中传词达意。笔译出现的较晚，当也不会迟于汉代。西汉刘向在《说苑·善说》中记有《越人歌》一首，据说是楚人翻译的越国船夫的唱辞，应是较早的笔译作品。笔译中又有直译与意译之别，所谓直译就是译文必须无条件地忠实于原文，而且要按照原文一字一句地译过来，“贵本不饰”^③是其最高境界，安息国外来的佛教徒安世高（本名清）是其鼻祖；所谓意译就是既要保留原作的风格，同时又不过分拘泥于原文的形式，译其大意，佛经翻译者鸠摩罗什开意译先河。

①（唐）魏征等撰：《隋书》卷35，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097页。

②《国语》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62页。

③（梁）释僧祐撰：《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54页。

一、近代翻译的特点

中国近代翻译是古代翻译的延续，它继承了许多古代翻译的优良传统，但又不是古代翻译的重复。由于历史阶段的不同，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近代翻译都远远超越了古代，具有鲜明的特点。

首先，翻译的前提与背景不同。在古代，中外文化的交流异常活跃，汉唐时期，中国与外界的文化交往曾达到相当的规模。当我们谈起曾英出使大秦、玄奘去印度取经、鉴真东渡日本以及四大发明的西传时，无不感到骄傲与自豪。那时中国的文化对东亚、中亚乃至欧洲文化发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也吸收和融合了多种外来文化，如佛教文化等等，来充实和丰富自己的文化内容。翻译作为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即使到了明末清初，这种正常的文化交流也不曾完全中止。其所以能做到如此，取决于以下两个前提：一是中国王朝本身的国势强盛和文化的先进与繁荣，二是外来文化不仅不足以构成对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的威胁，而且往往被吸收和改造利用。正如鲁迅先生所说：“那时我们的祖先们，对于自己的文化抱有极坚强的把握，绝不轻易动摇他们的自信力；同时对于别系文化抱有极恢廓的胸襟与极精严的抉择，绝不轻易的崇拜或轻易的唾弃。”^①但是到了近代，这两个前提都不复存在了，中国传统文化因其国势落后而日趋封闭保守，又因为封闭保守而愈益落后。

^① 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3页。

其次，翻译应是双向的，既有文化的外播，又有文化的内传。古代翻译以中国文化的外播为主，外国文化的内传为辅；而近代翻译则变为以外国文化的内传为主，中国文化的外播为辅。在古代，中国文化是强势文化，其文化不仅外播到朝鲜、日本、越南等亚洲各国，从政治到军事、从思想到宗教、从历史到科技，中国典籍大量地被译介出去，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汉文化圈；而且传播到了西方。到18世纪末，《论语》、《大学》、《中庸》、《易经》、《书经》、《诗经》、《春秋》、《老子》、《庄子》、《淮南子》、《礼记》、《赵氏孤儿》、《好逑传》等等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作品，被译介到西方，这无疑对启蒙主义思想家如英国的坦波尔、笛福，德国的莱布尼茨、歌德，法国的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魁奈、霍尔巴赫等人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然而，近代的情况却大不相同了，西方文化开始大量涌入中国，与此相适应，译介西方文化成了近代文化交流的一大景观。从1810~1919年，被翻译到中国的西学书籍不下3000种，且内容丰富，几乎囊括了所有学科。而同一时期翻译到国外去的中国书籍却少得可怜。虽至今还没有一个详细的统计数字，但对于中国文化典籍的西译，除了马礼逊、理雅各、卫三畏、卫礼贤等少数传教士及王韬、陈季同、辜鸿铭等少数中国翻译家外，也很难举出更多的例子来了。

第三，翻译的目的不同。古代翻译是从较为纯正的文化交流的角度进行的。以佛经翻译为例，佛经翻译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有计划、有组织的翻译活动，也是我国翻译史上的第一个重要时期。尽管佛经的翻译有统治阶级将其作为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工具来加以利用的功利目的，但这一目的却被深深地隐藏在文化交流之后。佛经的翻译群体都由僧人译者

构成，就足以说明这一问题。明末清初的翻译虽也有传教的目的，但作为接纳者的中国人和参与翻译的中国人，从总体上讲心态是较为平和的，亦即为了正常的文化交流。

但是时间进入近代以后，翻译的目的不再仅仅为了文化交流，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主题，同样也左右着翻译。近代翻译的内容从外国地理历史到实用科学知识，再到社会科学知识、文学知识的发展轨迹，正是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寻求救国真理的奋斗历程。用施蛰存先生的话说就是：“西方文明是由帝国主义者的炮舰政策护送进来的。我们先有大炮，毛瑟枪、轮船、火车，其次有了电报、电话、马车、瓦斯灯。其次有了纸烟、番菜、洋袜、洋布。其次才有《天演论》、《群己权界论》和《巴黎茶花女遗事》。这就得迟到1900年前后了。”^①

鸦片战争战败后，林则徐、魏源检讨了敌胜我败的教训，大胆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这是近代中国人提出的第一个向西方学习的口号。但这时他们只是从器物上向西方学习，即只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然而，此时的翻译远未达到“师夷长技”的高度，仅停留在弄清楚西方列强是从哪里来的所谓“洞悉夷情”的层次，无论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还是徐继畲的《瀛寰志略》，都是如此。

真正达到“师夷长技”高度的是洋务运动时期的翻译。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60~80年代，随着殖民主义侵略的升级，人们有可能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其认识较前更为深刻。冯桂芬在1861年著《校邠庐抗议》，说：“以今论之，约有四端：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

^① 施蛰存：《文艺百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70页。

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虽然在器物之外又比较了中西方在人才、地利、君民关系等方面的优劣，但结论仍然是：“有待于夷者，独船坚炮利耳。”至于其他方面，则“惟皇上振刷纪纲，一转移间耳，此无待于夷者也”^①。基于此，冯桂芬提出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即“中体西用”的思想主张，成为影响甲午战前整整一代中国人的主导思想。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中国人翻译西学的内容更为广泛。此时虽然仍有大量译介西方地理历史的书，但已从鸦片战争时的探讨西方列强从哪里来发展到探讨西方列强何以强。当然，更多的却是声、光、化、电的内容，直接配合“求强”、“求富”的洋务新政。

中法战争特别是甲午战争的失败，使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西方的文化不仅优越在“船坚炮利”上，而且在政治制度等方面也优于中国。于是，翻译的深度指向制度层面。大量关于西方政治、经济学及改革史、革命史、亡国史、独立史的书翻译过来，要求像西方那样确立起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的民主制度，以适应和推动新的生产力的发展，达到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目的。与此同时，西方的文学作品也被翻译过来，《黑奴吁天录》、《经国美谈》、《哀希腊》这些文学作品的译介，就是紧密配合救亡图存、争取民族自由政治目标的。

但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都失败了，现实迫使人们继续思考与探求，中国学习西方已经不少，坚船利炮引进了，科学技术引进了，民主共和引进了，为什么仍然不能变得像西方国家或者日本那样富足强大呢？于是，先进的中国人对中西文化的核

^① 冯桂芬：《制洋器议》，《校邠庐抗议》，上海书店2002年版。

心部分即文化的心理状态进行了更深层、更全面的比较与认知。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在比较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后，打出了“民主”与“科学”的大旗。1917年，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广为传播，先进的知识分子又把向西方学习的目光纷纷转向俄国。在救亡思潮的推动下，人们终于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马列主义。从此，近代翻译又掀开了新的一页。

第四，近代翻译的主体不仅有中国人，而且有外国人。从整个近代80多年的历史进程看，近代的翻译经历了一个外国人为主、外国人为主中国人参与、西译中述、中国人为主的发展轨迹。

鸦片战争前的西学翻译基本上是由外国人操控的，马礼逊、米怜、麦都思、郭实腊、裨治文等人的翻译基本与中国人无关，虽然其间有梁发等中国人的协助，但也仅仅是作为印刷工人参与其中。

第一次鸦片战争至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参与西学翻译。1843年以后，李善兰、王韬、管嗣复、张福僖等都先后参与过西书翻译工作。他们不仅开始参与翻译的选题，而且在翻译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如《续几何原本》便是在李善兰提议后着手翻译的；而管嗣复则拒绝翻译宗教书籍，表示只译科学书籍，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在翻译主体中地位的提高。

从19世纪60~90年代，近代翻译进入了西译中述阶段。西译中述即口译笔受，由外国人口头翻译，中国人用笔记录，然后加以整理润色。口译笔受并非始于近代，东汉年间，翻译佛经的过程中就已形成了这种翻译模式。如来自安息国的安

玄，天竺的竺佛朔，月支国的支娄迦谶、支曜以及康居人康孟详（祥）、康巨等人在翻译中即担任口译，严佛调、孟福、张莲等人则担任笔受。明末利玛窦、徐光启等人对西方科学技术书籍的翻译，也采用了这一模式。采用西译中述的模式，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精通两国以上语言的译才。近代中期，由于文化交往的种种阻隔，能够熟悉两国语言的中国人少之又少。传教士中虽不乏会讲汉语的人，但其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底却十分欠缺，译出的作品很难被自以为是文明上国的中国士人所接受，邀请中国人参加翻译并对译文进行润色便在情理之中了。无论是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局附设的翻译馆，还是墨海书馆、益智书会、广学会，到处都有中国笔受者的身影。尽管此时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中个别中国学者因精通英文，也独立翻译过几本西书，但影响不大。

8

从严复翻译《天演论》开始，近代翻译进入了以中国人为主体的新阶段。在传教士占主导地位的时期，翻译什么、如何翻译都非中国人所能掌控，因此翻译的内容自然受到局限。关于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足够的研究成果加以论证，但传教士的一番话还是颇让人思量的：“中国诚然需要西方学者所传授的哲学和科学，但中国必须从基督教传教士那里获得这些知识。……如果哲学和科学知识背离了基督教，那就会使人们自大和自信。……只有使哲学和科学的研究浸润于基督教的教义之中，才能使人们内心谦卑，使人们在宇宙的创造主面前低头。”^① 随着对外交往的加深，中国知识分子中有越来越多的人掌握了两门以上的语言，中国人自主翻译的时代到来了。从

^① 《基督教传教士大会纪录，1890年》，第471页。

1900~1911年,中国通过日文、英文、法文共译各种西书至少有1599种,占晚清100年译书总数的69.8%,超过此前90年中国译书总数的两倍。其中,从1900~1904年5年的时间,译书899种,比以往90年的译书还多。在这些翻译作品中,社会科学书籍最多,其次为自然科学,最后为应用科学,其顺序与此前几十年的译书顺序正好相反。^①这些译书紧密结合资产阶级的政治改良、政治革命运动与反帝反封建要求,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针对性。在翻译者队伍中,留学生特别是留日学生是其中坚力量。

当然,近代翻译还有许多自己的特点:如翻译理论越发成熟,不但严复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新标准,而且许多先进的中国人如高凤谦、梁启超、张元济、鲁迅等都为近代翻译理论做出过贡献;和古代一样,许多翻译为意译,但直译作品也开始大量出现;翻译者从集体翻译发展到单个人的翻译,翻译受机构操控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译品更趋自由;在译文的语言上,白话文逐渐代替了文言文,翻译作品逐渐走入平常百姓家等等。

9

二、目前研究状况与本书写作要点

近代翻译史是中国翻译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它的研究,近20年来所出成果已相当丰富。这不仅包括总体研究,也包括了专题研究和翻译理论史的研究。现简述如下:

^① 参见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14页。

首先是总体研究。

马祖毅的《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4年第1版, 1998年增订版)是第一部比较系统全面的翻译通史。它从周朝到东汉桓帝前, 从东汉桓帝末年到宋代、元代, 从明代到鸦片战争前,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 把中国古代到“五四”运动前的翻译活动分为五章进行阐述。在第五章中对近代翻译作了简要研究。在即将告别20世纪的1999年, 马祖毅再接再厉, 又出版了更为丰富翔实的专著《中国翻译史》(上)(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在这本翻译史中, 马祖毅在第六章论述了从鸦片战争到清末的西学翻译, 并在第七章中涉及了光、宣年间的文学翻译, 其他章节也有对近代翻译的论述。

除了马祖毅的两本大部头翻译史著作外, 臧仲伦的《中国翻译史话》(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王晓丹的《翻译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均是翻译史的通俗读物。前者是中国翻译通史(从古代一直写到当代), 后者则是近代翻译史。王克非编著的《翻译文化史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更从世界翻译史及文化史的角度对世界范围的翻译进行了整体概述, 第三部分是对中国近代翻译的研究。

熊月之的《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也当属于对近代翻译进行总体研究的力作。只不过它是以文化交流的大视角分析了西学东渐对晚清社会的影响, 其中就包括了西学翻译对近代社会的影响。邹振环的《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4年版)与《译林旧踪》(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则是以译著、译者

或翻译机构做主线，对近代翻译的整体勾画。

另外，潘玉田、陈永刚的《中西文献交流史》（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9 年版）也在相当程度上对中国翻译史作了研究，第六～九章即是关于近代翻译史的内容。

其次是专题翻译史研究。专题翻译史又称学科翻译史，包括自然科学翻译史、社会科学翻译史、文学翻译史等。

在自然科学翻译史方面，有黎难秋的《中国科学文献翻译史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该书共分上、中、下三编，上编第四章是“清末科学文献的翻译”，中篇“科学文献翻译与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对应各章节分别有近代自然科学书籍在中国译介的论述，下编则为“科学文献翻译对我国一些学科领域的影响”；李亚舒、黎难秋的《中国科学翻译史》（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是一部系统论述中国科学翻译历史的学术性专著，它包括总论、汉至明初的科学翻译、明清两代的科学翻译、民国时期的科学翻译、新中国的科学翻译等几大部分，关于近代科技翻译占了相当篇幅；杜石然、林庆元、郭金彬的《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科技》（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也有相当篇幅论述了近代自然科学译介的情况。有关自然科学翻译史的论文相当丰富，有的以译著作为研究对象，有的以翻译家作为研究对象，有的以翻译机构为研究对象。由于篇幅所限，不能一一列出。

社会科学包括的内容相当广泛，因此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完整论述社会科学翻译史的论著。社会科学翻译史的研究均散见于各种著述之中。《论严复与严译名著》（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是一个论文集，收入论文 8 篇，均为严复翻译研究的力作。

文学翻译史研究方面，陈玉刚主编的《中国翻译文学史稿》（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年版）是较早的一部翻译文学史，从1840年一直叙述到1966年；在近代翻译文学研究中做出突出贡献的是郭延礼。针对近代翻译文学少有人作专门的、系统的研究的状况，从20世纪90年代起，郭延礼即投身到近代翻译文学的研究中，相继出版了《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对近代翻译文学史上的翻译流派、翻译家进行了比较爬梳，是近几年不可多得的力作。王宏志的《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上海出版中心1999年版）在文化层面对20世纪初中国文学翻译进行了文化剖析。王向远的《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对近代中国日本文学翻译史作了开拓性的研究。

12

第三是翻译理论史研究。刘重德编著的《翻译漫谈》（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是一本翻译经验集，其中一些内容涉及到了近代翻译理论。陈福康的《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是一本译学理论的专题史。作者按照一般的中国历史分期，分古代、近代、现代和当代四个部分来叙述。在第二章“中国近代译学理论”中，对林则徐、冯桂芬、傅兰雅、马建忠、康有为、梁启超、严复、林纾、张元济、高凤谦、罗振玉、王国维、周桂笙、周作人、鲁迅、章士钊、胡以鲁、胡怀琛等人的译学理论均进行了详细的探讨。

另外，王扬宗的《傅兰雅与近代中国的科学启蒙》（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王晓秋的《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2000年版）、李喜所主编的《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